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9

王嘉良学术文集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9

王嘉良学术文集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9卷,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王嘉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21-4250-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嘉良-文集 ②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17.2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928号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9卷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

王嘉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金华市三彩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36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5321-4250-7/I·3284

定价: 386.00(元)(共12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79-82676863

目 录

地域文化与“浙江潮”

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建构	2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34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49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	69
开拓与创造:地域文化精神的生动张扬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功	81
引领新潮:浙江作家群领衔新文学流派的意义	95
“浙江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109
浙江作家群体昭示“传统内的变化”	124
文化转型与当代“浙军”创作的流变	
——一个典型地域文学现象的解剖	132

地域文化与作家群体

启蒙语境中的乡土言说

- “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论 151
- 论地域文化视阈中的“湖畔”诗人群 171
- “白马湖”作家群：精神品性与审美追求 186
- 语丝作家群：地域色彩与文化定位 203
-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
- 论浙东左翼作家群 218
- 地域文化视阈中的“《现代》作家群” 236
- 论战时东南文艺运动中的“浙江潮” 251

地域文学与文学思潮

民俗风情：透视“乡土中国”的生存本貌

- “民俗文化”视阈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266
- 眷顾与批判：民俗叙事的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 281
- 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295
- 地域文化视阈中的浪漫文学诉求
- 论“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 309
- 地域背景与文化精神的聚合
- 湖南左翼作家群论 323

作家的地域文化溯源

略论越文化的“近传统”精神特质与意义	342
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	354
两浙人文传统:中国新文学巨匠茅盾的内源性文化承传	368
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382

地域文化与“浙江潮”

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建构*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崛起,曾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界着力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时,严家炎先生就谈到,研究区域文学须“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而“五四”以来从浙江走出的著名作家最多,且“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 and 探讨”。^①此说甚是。浙江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不只阵容壮观,可以载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②,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家还是现代文学思潮或文学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往往是他们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这个作家群体的生成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的确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

*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2009 年第 21 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12 月 15 日 6 版摘要转载。

①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和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1998 年版,丛书卷首。

② 陈坚主编:《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介绍浙江新文学作家 129 位。这个数字还不是很完整的,《浙江省文学志》(中华书局 2001 年版)所载的现代浙籍作家,超过此数甚多。

象,至今仍缺乏深入研究的论著。对这一文学现象,过去也曾受到部分关注,如彭晓丰、舒建华所著《“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①,探讨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学先驱者对中国新文学的开创之功;笔者著有《浙江20世纪文学史》^②,发表部分研究“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的论文等。但对这个作家群体的研究,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不足有二:一是研究视角多半局限于“浙江文学”自身,缺少由此及于整体的观照,因此也便限制了由特定地域入手总结整体文学经验意义的拓展;二是部分论著涉及到地域与整体的关系,但涉及的范围很小(如仅止于“五四”或新文学“发生意义”等),对这个群体建构的深层因素及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深刻的经验,尚缺乏深入的挖掘与剖析。作家群体的研究,并不在于揭示群体本身的成就,重要的是要探讨群体生成的“意义”及对后来文学的“启示”。本文拟从地域人文传统角度探究群体生成的深层动因及其文学史意义,旨在对这个作家群体的研究有所深化。

一、人文传统:地域背景中“人文因素”之重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五四”以后的强势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生成机制肯定同“五四”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启蒙文化思潮紧密相关,但若是从“地域学”的“面型”语码看,却不能不说与此地的特殊地理区域种型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而且从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整体背景考量,在时代语境相同的情况下,浙江一地异军突起,则后一层地域文化因素显得更为突出。谈到地域文化因素,“地域”应是一种诸元素的“综合性”呈示,显现出“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性形态,不只是自然生态上的“地域性”。诚如严家炎所言:“地域对文

① 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①。文化在其累积过程中,总是不断同其他因素“综合”而丰富其内涵,产生出新质。文化传统越是发展到后来,越是同人文素质相联结,形成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为后人承传。纵观浙江文化发展历史,体现“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固然已积淀为本地域的思想文化资源,如王思任之谓“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就乐于为近代浙江人引用,鲁迅曾不止一次提及。然而,从深处看,对于近现代浙江人(特别是浙江士人)产生深刻影响的,恐怕并不只是“报仇雪耻”之类的文化命题,应当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从文化发展的走势看,如果考虑更多“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因而也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应该是体现“近传统”意义的“两浙文化”传统,而首先可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是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自宋、明开启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曾有过显赫地位,由此必造就此地浓烈的启蒙文化氛围;而思想启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中国新文学作家最初是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切入新文学建设,其中又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浙江作家鼓吹最力。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可以认定:正因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浙军”介入新文学革命的一种重要思想文化资源,遂有其在注重启蒙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卓然独步的辉煌。文化溯源应是历史踪迹的探寻,寻绎浙江的启蒙文化思潮,也可以追溯较远,但就确立近代理性所必须的启蒙文化精神而言应始自南宋。文化的发达景状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偕行进的。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文论述因北方战乱不息,而“东南久安”,中国的文化中心有过三次南迁,认为

^①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和区域文化丛书·总序》。

“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浙江、杭州又成为“江南的核心”^①。此说甚为有理。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里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厚财富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景观。“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词描述的钱塘人杰地灵、文化发达景状正是对此的形象写照。在此氛围中必造成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影响所及直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②当代学者余秋雨也曾著文指出：“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上，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不亚于滔滔的黄河了。”^③近代以来，此地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特别是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的龚自珍，更是从浙江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5、20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3 页。

③ 余秋雨：《〈姚江文化史〉序》，《姚江文化史》（季学原著），宁波出版社 1998 年版。

师,其思想学识不独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①,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对于“龚学”,梁启超也极为推崇:“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②由是观之,以启蒙思潮为核心的两浙文化传统,早已处在引领全国文化新潮的位置,并事实上构成了对处于急剧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以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尤其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士人施加深层影响。在此“背景”上,后来走出一个以启蒙为重任的新文学作家群体,正可以说是对一种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的一种蓄势已久的喷发。

这决非虚言。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建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传统积淀的因素也不能低估。两浙文化传统的刻骨铭心的熏染,总是使得浙江作家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他们往往对此地自宋、明以来颇盛的启蒙文化思潮表现出自觉的怀恋与认同。20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崛起,在日本东京创办《浙江潮》,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蒋百里、许寿裳等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臣。他们当时就“发大声于海上”^③,表达出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而在发出的声音中,最响亮的便是受到“乡先贤”的启迪,作出如此激昂的发问:“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④这里所说的文明“中心点”,显然是指从南宋以来一气贯注下来的两浙文化传统曾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表露出新一代浙江学人自觉追踪同乡先哲,油

① 王文濡:《龚定庵全集序》,世界书局1935年版。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③ 《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1902年)。

④ 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

然而生承传地域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和紧迫使命感。不妨说,带着一种对于前贤造就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接受意识,应是许多浙江新文学作家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开拓新文学努力的原动力之一。这只需举周氏兄弟为例便可印证。

鲁迅对地域文化的承传,是基于一种自觉的传统接受意识。其在早年写出的《文化偏至论》中就表述过:匡救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对于鲁迅而言,这“固有之血脉”包涵整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自然也包括两浙(特别是浙东)文化的“血脉”。两浙深厚的文化底蕴,对鲁迅始终有着不可名状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因而其意识深处也便有无可抹去的“乡前贤”思想的印痕。是故在他走出越中以前,便有校辑《会稽郡故书杂集》,“集资刊越先正著述”,“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①之举。他最为推崇“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为整理、校勘《嵇康集》历时23年之久(1913—1935)。在他赴南京求学、东渡日本之后,经受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于内、外两面的文化新潮都有所汲取,而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两浙人文精神依然是“供其景行”的重要思想资源。他对于两浙文人,尤其是浙东学派的启蒙思想家,始终怀着敬仰之情,如竭力推崇客死异乡的明末“遗民和逆民”朱舜水^②,在日留学期间不忘造访其“客死的地方”——水户^③;念念不忘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将其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一直引为光荣。他后来最早表现出启蒙意识的自觉,不能说没有先贤的影响。周作人对两浙人文传统的推崇有过于乃兄。他在其著名的《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历数“近来三百年”的两浙人文传统,勾勒自徐渭、王思任、张岱至袁枚、李慈铭、章学诚直至章太炎的浙籍文化先驱冠盖

①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页。

② 鲁迅:《华盖集·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③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一时的成就,内中不乏叛逆道统的文人学士,自然也有尽力鼓吹启蒙思潮的“浙东学派”健将。他称这一“异端”思潮形成时期乃是中国“在文学进化上”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①,其对“乡前贤”的推崇可谓溢于言表。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甚至将中国新文学“源头”追溯到晚明,认为“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的重演,举证便有浙籍启蒙文学先驱徐渭、张岱等。周作人在论述转型期文学思潮时经常使用“王纲解纽”的字眼以喻急剧的社会变动促成思想文化与文学变革的可能性,这同明清时期浙江启蒙思想家与文学家用“天崩地解”概括当时的社会思潮以推进新文化思潮,也有精神上的暗合。也许,正是有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当“五四”前后面对几近相同的思想解放潮流时,遂有新文学作家承续先贤的启蒙文化要求,挺立潮头再作思想启蒙的呐喊。

诚然,浙江新文学作家承传乡前贤的启蒙文化精神,介入“五四”做一以贯之的思想启蒙工作,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与乡前贤找到诸多有形的联系。最典型的例证,是晚明时期的小品作家群与“五四”时期的“语丝”作家群的精神传承。传统散文作家中以叛逆封建道统著称表现得富有生气的是晚明小品作家,五四散文中作为纯粹的散文流派呈现,且在五四文化氛围中以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见长的,当首推“语丝派”。语丝作家最显著的思想特色是坚持启蒙为重的文化立场与姿态,他们秉承“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②,只有“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劣根性,这才是民族再生的希望”^③等理念,始终承担着改造民族灵魂的思想启蒙重任。语丝派作家创造的“语丝文体”包括小品文和杂感文两大类别,以及擅用讽刺、幽默的语体特色,提倡率性自由的文体风格等,也同晚明

① 周作人:《谈龙集》,开明书店 1930 年版,第 12—14 页。

② 鲁迅:《两地书·八》(1925 年 3 月 31 日),《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31 页。

③ 周作人:《答木天》,《语丝》第 34 期,1925 年。

小品最为类似。这里就有两种文体、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有形联系及群体生成的相同地域文化因素。晚明(尤其是“明末”)小品作家中,浙江籍作家占了很大比重,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小品作家如张岱、王思任、祁彪佳等,均出自浙江山阴。所以周作人断言体现晚明文风“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①。值得注意的是,语丝作家群也是“浙江色彩”特别浓重的,以至于当年陈西滢曾讥《语丝》是“某籍”(按指浙江籍)、“某系”的刊物。^②因为无论是《语丝周刊》(后来是半月刊)的发起人还是主要撰稿人,多半是浙江人。最主要的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孙福熙、俞平伯、章廷谦(川岛)等,而周氏兄弟则被称为“语丝派”的主将。这绝非偶然巧合,从深层次的文化现象看,这同浙江以至于江南地域自晚近以来浓烈的启蒙文化思潮有关。自晚明至“五四”,浙江作家都显现出革新传统的超前文化意识和叛逆道统的思想解放精神,于是就有他们在两个不同时代里创作上的遥相呼应。

然而文化的承传更多是无形的,是精神上的,一个地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总是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为后世留传。考量浙江新文学群体对两浙启蒙思潮在精神上的呼应,也许更触及承传关系中的本源性问题。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启蒙思潮所关注的最根本问题,是确立人的近现代理性,使人摆脱封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获得个体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释放。在这一点上,最能见出浙江新文学作家与他们的前辈在精神上的相通。浙东学派所鼓吹的启蒙思想,便包涵有针对长期经学统治造就的忽视人的现实存在和自身发展的弊端,而提出重新审视人的全新观念。无论是“事功学”的强调现实精神:“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③,体现为对于人的经验世界的尊重和对人的生

①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②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

③ 叶适:《进卷·总义》,《水心别集》卷六。

存的合理肯定;抑或是“心学”的“以心为本”,提出“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①,敢于同天道抗衡,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精神主体性,无一不显示出同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至近代,浙江启蒙思想家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化,龚自珍高唱“人”的赞歌:“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幸,非道非极,自名曰‘我’”^②,对“天人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作了全新的阐释,张扬人“自我”对命运的主宰,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返观浙江新文学作家,也正是在“人学”命题上作出了承续前贤又超越前贤的探索。“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注重人的思想、精神启蒙,确立“人的文学”观念。因此执着于“辟人荒”的工作,谋求“人的觉醒和解放”,便成为新文学先驱的共识,也必然形成新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有意思的是,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恰恰是由浙江作家首先择定的。周作人首创“人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建设中无异于炸响了春雷;茅盾、郁达夫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过“人性解放”、“个人发现”是五四文学“主要目标”的意见^③;而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大师,早在新文学诞生前夜,就已在《文化偏至论》等文中提出系统的“人学”理论,体现了最显著的“人的意识”的自觉。在创作方面,尽管早期浙江作家对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的选择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基于其自觉的启蒙意识,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如郁达夫的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湖畔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情感备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诗作表现对自由人性的向往等等。从中不难看出对两浙人文精神中异常鲜明的反叛“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统在精神上的承传,

① 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

②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③ 茅盾《关于“创作”》、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

其创作中的启蒙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启蒙精神的现代延续。

二、历史机运：“小传统”地域占得文化先机

地域人文传统作为一种新文化的生成机制,对于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生成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个群体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猝然爆发,还取决于独特的历史机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的创造。^①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生成亦然:由于时代为他们提供既定的条件,特定地域占得文化先机,遂有这一群体在一个特定时期的整体集结。

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面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②。此说概括了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用来说明浙江文化传统的近现代进程颇有启迪。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能够在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近代文明思潮的洗礼,便源于这一块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

“小传统”地域之具有文化生机,是在于“面海”的拓展性、开放性优势,同“大传统”的封闭性、固守性相对,它蕴涵着融通新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②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5页。